

经典

沃尔科特：重铸史诗的当代荷马

□远洋

3月17日，德瑞克·沃尔科特逝世，举世哀悼，在中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掀起阅读其诗歌的热潮。1949年，年方19岁的沃尔科特出版了他的处女诗集《二十五首诗》(25 Poems)，在人口仅仅十几万、面积只有616平方公里的圣卢西亚(1979年独立建国)引起轰动。这个消息传到不远的特立尼达，那时还在上中学的奈保尔知道了，为之惊奇、激动不已。多少年后，奈保尔撰文(《奈保尔评沃尔科特》，孙仲旭译)回忆这段往事，说虽然读沃尔科特的诗“如堕雾中”，“当时，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，1949、1948年，无疑还有此前几年，在我原以为一片荒芜的这些岛上，我们中间还出了这么一位天才，这种眼光、这种敏锐感觉、这种语言才能，把我们知道的很多平常事物神圣化。暮色中划船归家的渔民意识不到他们穿越的静寂。我们住在特立尼达，在几乎完全闭合的帕里亚湾，此海湾在本岛和委内瑞拉之间；如此准确描述，细节之上再加细节——渔民和很快暗下来的暮色中的影子，这种景象我们都知道。1955年我在伦敦读这些诗时，觉得能够理解普希金对俄国人有多么重要，为他们做了以前无人做过的事。我当时便是如此推崇沃尔科特。”

就像约翰来到帕特摩斯岛，在礁石与蓝色清新的空气之间，

强迫他的心平静，就像这儿环绕着

波浪上洒满的银光、树木天然的头发、乳白色海湾的

丰满乳房、棕榈树、鸟群，还有绿色萎谢的

叶子，我脸颊上太阳的铜币，在那里

独木舟拥抱阳光的力量，就像约翰在阴冷空气中，

于是被这些蔚蓝景色更慷慨地欢迎，希腊人在那里，

于是将不再离家远航，我可以在这儿言说。

沃尔科特堪称少年天才，14岁即开始在当地报刊发表诗歌。从一开始，他的诗歌就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和地域性色彩。他土生土长的地方，正如1992年诗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《安的列斯群岛：史诗往事的断想》(王永年译)里所说：“人种混杂，语言繁多，没有历史背景的沸腾的生活，像天国似的，这样的一个城市在新世界就仿佛是天国，作家的天国……湮没的语言和个人的词汇早已存在，诗歌创作是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……对于每一位诗人来说，世界上永远是黎明。历史是被遗忘的失眠之夜……”

沃尔科特就是在这样的黎明里，睁开了婴儿般灵性的眼睛，打量面前这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，开始写出他的不朽诗篇。最初的《在我的十八岁里》(日记)《给伦敦一位画家的信》等诗，尽管今天看来，特别是与他后来的作品相比，有些稚嫩青涩，但与同龄人相比，却已显得早熟老成——少年的心至少已经尝到生活的艰辛苦涩了，甚至有些沧桑之感；而他日后的创作方向、价值观和创作观也从中初露端倪。

融多元文化于一炉

闲散的八月，大海温柔的时候，
棕色岛屿的叶子粘附于加勒比海
边缘，我吹熄了灯
经过玛丽娅·康色普申无梦的脸
上飞翔号纵帆船做水手。

“现在，他已在一个名叫萨宾的人身上表达了这一主题。这是‘飞翔号’上一个贫穷的黑白混血

水手，西印度洋平民的尤利西斯，他的心里充满了风、诗歌和女人。”爱尔兰大诗人希尼在《流放的语言》(胡续东译)所评论的，是沃尔科特颇有自传色彩的长诗“飞翔号”纵帆船。我查询了几种辞典和相关外文资料，汇录如下：萨宾，原文Shabine。蔑视性的称呼。在多米尼加、瓜德罗普岛、圣卢西亚等加勒比海地区，主要用于指称皮肤白皙或浅肤色的女人，通常是黑白混血儿；加勒比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，名萨宾娜(Shabine)，又名贾斯汀娜(Jasmine)，是一个因贫穷和混血儿而被嘲笑的妇女。或喻美德的不幸。总之，在这里，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失去自己的名字，或者根本就没有名字，统统被白人叫做“萨宾”或“萨宾娜”，黑人和混血儿之间也用它们来给别人取绰号，辱骂对方。

这个除了绰号“萨宾”没有自己名字的小伙子，满脑子是他爱恋的女人“玛丽娅·康色普申”的形象，自述“离开堕落，我的灵魂插上翅膀，/但他们已开始用大房子、大车、红极一时的波波，/苦力、黑鬼、叙利亚语和克里奥耳法语/使我灵魂中毒”，但他毅然决然将这些诱惑丢弃在身后，走向大海和动荡不安的生活，踏上跨越西印度群岛的航程，同时也走上孤独的自我探索之路。

他目睹殖民地官员的种种腐败，“我看见了让一个奴隶在特里尼达/所厌恶的一切，街头小混混的共和国”。他试图探寻种族的历史，但是，“我看不见它们珊瑚：脑，火，海扇，/死人的手指，而且有，死人/我看不见粉末似的沙，是他们的骨头/从塞内加尔到圣萨尔瓦多被磨得雪白。”爱的幻想破灭之后他寻求肉体刺激，“但是，一旦她们剥得赤条条，她们钉子般的阴户/长满海胆似的刺毛，我无法潜入。”他穷困潦倒，到处漂泊，无家可归，“天哪！哪里是我歇息的地方？哪里是我的海港？哪里是我不花钱就能得到的枕头，还有那能从窗框里看我生活的窗户？”

沃尔科特的父亲是英国人，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黑奴的后裔，在《“飞翔号”纵帆船》中他说，“我只是一个热爱大海的红黑鬼，/我受过健全的殖民地教育，/我身体里有荷兰人、黑人和英国人，/要么我什么都不是，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。”这几行诗可以说是对自身血统及文化背景的“寻根”，但同时又透出外在身份与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分裂。

现在我没有民族只有想象。

在白人之后，黑人也不需要我了

一旦权力朝他们那一边摇摆。

第一次用铁链锁住我的双手并道歉：“历史”，第二次说对于他们的自尊而言，我还不够黑。

既受到白人排斥又被黑人拒绝，真是令人哭笑不得，冷幽默中自嘲之意溢于言表。他是黑人和白人两个社会的“他者”和“异数”，一个永远的陌生人、边缘人，这不能不让他深感悲哀。然而，对于真正的强者，苦难会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，这些也是成就沃尔科特之伟大的因素。萨宾在污秽现实和厄运处境中挣扎，在写作中找到了精神寄托：

很好，当我写下

这首诗，每个诗句都在盐水里浸透；

我把每一行牵引、打结，像系紧

索具上的绳索；在朴素的言说中

我普通的语言去成为风，
我的书页是飞翔号纵帆船的帆。
他在船上偷偷写诗，却因此受到船员的嘲笑，
他的诗歌“练习本”被一个厨师夺去，“并抛掷给左
右其他船员，/大声叫喊着，抓住，/还开始拿腔
捏调地学我，/就像我由于诗歌/成了一只母鸡。/
某些情况下动拳头，某些情况下动浆叉，某些要动
刀子——这一回动了刀子。”在经历过侮辱、干架、
风暴中死里逃生等种种磨难之后，重归心灵的平静，
他坐在星空下航行的船头，恍有所悟：

我最初的朋友是海。如今是我最终的。

我缄口不言。工作，而后阅读，

悠然坐在桅杆钩挂的提灯下。

试图遗忘幸福为何物，

无法排遣时，我察看星星。

殖民地历史、残酷现实、身份困惑、语言诘难、

反思了自己的乡间生活，从中也可看出他长期以来的转益多师，已经让他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师，艺术水准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。其中，第15章向安娜·阿赫玛托娃致敬的长诗，写得尤其动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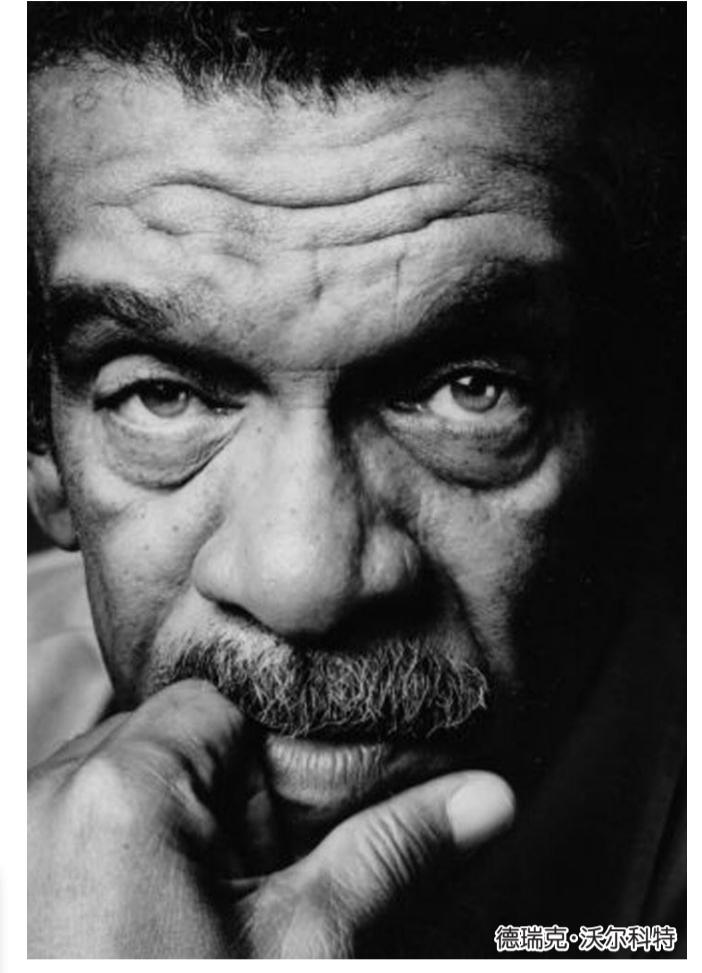
你是麦田与堤堰的安娜，

你是浓密冬雨的安娜，

烟雾弥漫的月台和寒冷列车的安娜，

在那不在场的战争中，沸腾站台的安娜。

从沼泽边缘消逝，
从下着毛毛雨，冻得
起鸡皮疙瘩的滩涂上消逝，



德瑞克·沃尔科特

在闭锁的下巴里，缄默尖叫声。”

1990年问世的叙事长诗《奥美罗斯》(Omeros)是沃尔科特的代表作，它长达300多页，分64章。Omeros即荷马的古希腊语名字。作品借鉴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的框架，挪用基本情节、场景和人物原型，如特洛伊战争中的两位大英雄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，摇身一变，分别成了加勒比海一个讲英语、一个讲法语的渔民，海伦成了渔民之妻——圣卢西亚被称为“西印度群岛的海伦”——象征着英法殖民主义者对它的反复争夺，历史上先后发生过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战争，就好像当年为了争夺海伦而爆发的特洛伊之战。此诗堪称宏篇巨制，气势恢弘，描绘了加勒比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，也反映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及所遇到的挑战。这部作品被称为“加勒比的庄严史诗”。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(邹海译)中说，“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另一个线索：‘新爱琴传统’。加勒比海群岛可以说是爱琴海群岛的转世重生——希腊的古代文明在加勒比的今日风采中得到自然的体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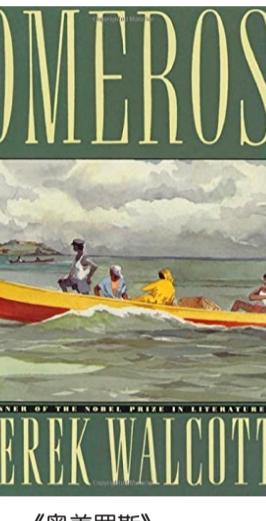
在《潮汐的声音》(程一身译)一文中，布罗茨基将沃尔科特与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古罗马诗人、哲学家卢克莱修相提并论：“确实，如果有一个似乎与沃尔科特有许多共同之处的诗人，它不可能是英国人，而是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的作者，要不然不是‘物性论’的作者。”瑞典皇家学院认为他“忠于三样东西——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、英语和他的非洲祖先”。他的生活经历、加勒比海、非洲血统、英语文化都成了他的创作源泉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将加勒比海一并纳入西方和非洲历史文化传统，调用并融多元文化于一炉，重写甚至解构、颠覆史诗，在无人言说的地方开始言说，在没有历史的地方创造自己的历史。他本人也为“西印度文化找到了自己的伟大诗人”而自豪。这位当代荷马的诗歌将永远在月光下的世界上被人们世代吟诵：

细雨渐紧，像一把竖琴的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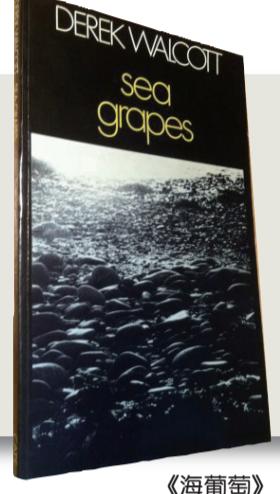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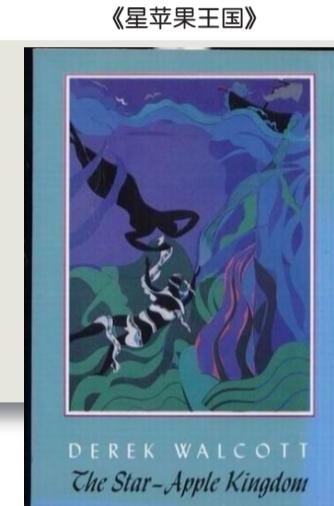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眼神阴郁的男人拾起雨点

拨响奥德赛的第一行。

(注：本文所引诗歌均为作者远洋所译。)



《奥美罗斯》



《海葡萄》

早期青绿诗篇初现雏形的安娜。

……

冰雪般异国的，
初恋般遥远的，
我的阿赫玛托娃！

重铸史诗的当代荷马

沃尔科特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说：“我们的群岛成了脱离原先大陆的碎片的同义词。这也正是诗歌创作的过程，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，再创作的过程，拼凑破碎的记忆，搭成神像的框架，甚至最后把神像付之一炬的仪式……从《罗摩衍那》到《征讨》，从瓜德罗普到特立尼达，到处可以看到破灭的非洲王国、亚洲的断垣残壁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遗迹的断片，不是埋在地底，而是在我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搏动。”

在《星苹果王国》的开头，一种文化的乡愁扑面而来：

在岛上各郡里，依旧有古代田园画
碎片——牲畜在那儿饮水，它们的池塘
有着更古老的天空的阴影，从风景画摹仿
“瓦伊河谷日落时赫里福德牛群”
这类题材时就存在。

但这种文化却深深地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，似乎是摹仿的赝品。“奇怪地，憎恨的故意隐藏于缓慢流淌的河/与阳伞般百合花的梦中，在古老的殖民地家族/漂亮的快照里”，而在“历史造孤的岛屿”，“村里底层的善良黑人们，/他们的嘴



德里特洛·阿果里

2月4日下午，我正在翻阅自己翻译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阿果里诗选《母亲阿尔巴尼亚》时，突然接到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参赞白云斌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，阿尔巴尼亚当代最有影响和威望的作家、诗人、社会活动家和文艺评论家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德里特洛·阿果里因病医治无效于2月3日与世长辞。我听闻此事五雷轰顶，翻阅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赠给我的35种他自己的著作，陷入哀痛的回忆中，我只能用还散发着油墨香的诗选《母亲阿尔巴尼亚》在长城脚下为我亲爱的阿果里大哥送行。

我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后，阿方予以积极响应，为巩固和发展传统

为阿果里大哥送行

□郑恩波



的中阿友谊而努力。中阿两国文化部门不久前还签订了未来5年的合作、交流协议。外研社要我翻译一部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选，我经过再三斟酌，选定了《母亲阿尔巴尼亚》。书中的100首诗作是从阿果里的15本诗集中精选出来的，可以反映他一生诗歌创作的全貌。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坛引领风骚的巨擘，在文化界、政界和人民群众心中有很高威望。正如小说家、电影剧作家基乔·布卢希所说：“阿果里是20世纪阿尔巴尼亚最伟大、最阿尔巴尼亚化的作家。”也如文艺评论家留安·拉玛所说：“阿果里是一个历史人物，对多数阿尔巴尼亚人来说，他的名字像新文学之父、诗人纳依姆·弗拉舍里以及

青年作家、诗人修改文稿，发表和出版作品。他与故乡德沃利的农民过从甚密，我亲眼看到过他与淳朴、憨厚的德沃利山民在地拉那旅馆开怀畅饮，让烈酒醉歪了面颊和双唇。故人到地拉那办事处不住旅馆，他就把他们请到家里住，并且还要好喝款待几天，如同亲人一般……

阿果里是一个真正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信仰的人。他担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、人民议会代表、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主席近20年，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怀有耿耿之心、拳拳之忧。政情发生剧变以后，一些极端分子否定一切，甚至连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及反映这一战争的文学也遭到嘲讽。对此，阿果里斩钉截铁地写道：“对于我来讲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，是高于神圣事业的神圣事业。”“民族解放战争两岸联结在一起，一岸是过去的传统，一岸是现代社会……拼命想捣毁这个坚固而巨大的桥梁拱顶的人，是要毁掉整个桥梁。”“我对我的作品不做丝毫修改，它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历史时代，表达的是民族和社会主义理想。只要现在和将来有富人和穷人，就要有社会主义理想。”

阿果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直怀有深挚的友好情谊。还是在苏联留学的青年时代，阿果里就与几个留苏的中国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尚不足30岁的阿果里，就连续写下

了赞美《祝福》《革命家族》等中国优秀影片的评论文章和纪念鲁迅的学术论文，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。1967年，他在阿尔巴尼亚《人民之声报》上连载长篇访华通讯《从松花江到长江》，书写了对中国工人、农民群众的热爱和崇敬之情，唱出了真正的“阿中友谊之歌”。

据我所知，阿果里是对中阿关系、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给予公正、积极评价的开明人士。1991年，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，阿果里中肯而尖锐地批评了劳动党中央落后错误的对内、对外政策，对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表示了公正、肯定的态度，为中阿关系说了公道话，显示了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。后来，在介绍中国当代情况的著作写的序言中，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，并预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最友好、最真诚的感情。

这种友好的情谊，也体现在我们之间

长达半个世纪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中。

我是52年前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，在挚友泽瓦希尔·斯巴修的引见下与阿果里相识的。那时他才33岁，是《人民之声报》的著名记者，经常发表很有艺术感染力的通讯、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。我欣赏他的作品，他的那些优美清朗、厚实明丽的作品，对我后来到《人民日报》所从事

的长达10年的新闻工作，产生过很大影响。在斯巴修的帮助下，我翻译了阿果里的著名抒情长诗《德沃利，德沃利》。后来，我还翻译了他的另外两首长诗《父辈》《共产党人》和一些短诗，在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前夕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《阿果里诗选》为名出版。此书出版后，我们之间的友谊登上了新台阶。

1990年夏天，我受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的特别邀请，再次踏上“山鹰之国”的神圣土地，又沉浸在以阿果里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文友们友谊的海洋中，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月。阿果里曾在办公室与我促膝交谈一个上午，还把摆在办公桌上两公斤重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之父纳依姆·弗拉舍里的半身铜像赠给我。最使我难忘的、也是对我的阿尔巴尼亚文学翻译、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，是他以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名义送给我的10位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的精装本文集，令我的书屋大放异彩。

几年前，我有幸再去阿尔巴尼亚工作了两次，与阿果里的交往更加密切。他把近年来出版的20多种书全都赠予我，在签名时还亲切地称我“弟弟”；我也骄傲地称他“哥哥”，我们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异国兄弟。

对我国广大读者和观众来说，阿果里这个名字并不陌生，3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阿尔巴尼亚影片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《广大的地平线》，正是改编自阿果里的小说。8年前，我翻译的他蜚声欧美文坛的长篇幽默讽刺小说《居辽同志兴衰记》，在作家们引起热议。现在，阿果里诗选《母亲阿尔巴尼亚》也已经付梓。不久，由我翻译的阿果里长篇小说《藏炮的人》也将与我国读者见面。